

中華書局

胡秋原

政治文艺哲学文选

李敏生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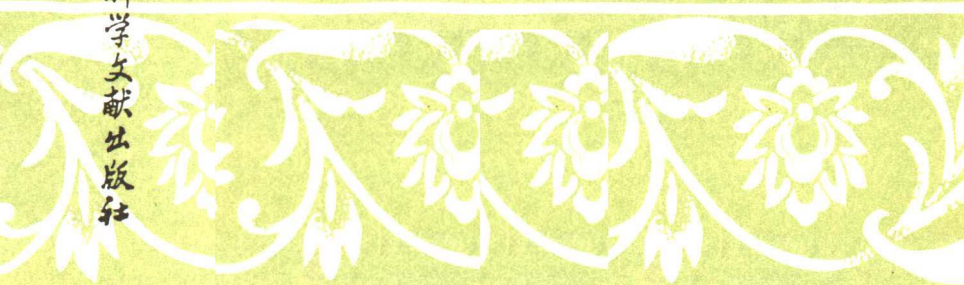
中華心

胡秋原

政治文艺哲学文选

李敏生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8 号

中 华 心

——胡秋原政治·文艺·哲学文选

李敏生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政编码: 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新世纪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19印张 484千字

印数 0001—3000

1995年 7 月第一版 1995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 80050 677 0 C·56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我的时代与我的思想)

胡秋原

我这一生大概至少写了二千万字的文章。但我已离开故乡四十五年。今天七十以上的人，也许还有看过我当年的文章的。承李敏生先生的盛意，将我多年来写的选出三十多篇介绍于一般父老兄弟姊妹之前，自是我晚年极为快慰之一事。

我的文章，都是我的思想的表现，而我的思想，不待说是我的时代的产物。我的时代，包括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二次大战后美苏冷战之始终。这是中国民族在帝国主义侵略和侵害之下最不幸而悲惨时代。我的思想——也便是与有关的国际形势之分析和国家命运之思考。

如我在集中《八十年来》所说，我曾受到中国救国的西化、俄化两大潮流的影响，但终于成为反潮流者，形成我的思想，而我的思想，也经过三个时期的变化。兹不赘述，只概括几个要点。

一、在我只能看中国文书之时，我自不能不受两大潮流的影响。但我从未信仰任何一派。这由于五四潮流中出来的我，不喜欢过分崇洋，而他们对于日本问题，中国富强之道，并无正面的答案。而等到我能自由的由美日文及其译本看到许多外国书之后，我感到西化派对科学观念是误解的。他们说科学方法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我知道，科学是一套概念系统，与一定的实际

现象相符，科学方法乃是基于观察、计算、推理、实验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或不变关系。又西化派以为中国历史只能由商代开始，因有殷墟甲骨文为证。然殷墟甲骨是到清末才发现的。这决不是说，清末以前的中国历史不能谈商代，必须清末以后才能谈商代。但我们又何能断定，今后不会发现夏代文物呢？（现在确已发现了。）

“九·一八”、“一·二八”后，我已力主举国团结抗日。在抗日之中和胜利以后，中国必须进行工业化，民主化。这是中国落后之处。为了工业化，必先发展民族资本，然后实行社会主义。这是我参加福建事变的原因。

此后，我到欧洲和美国。我发现他们因不忠于自由的原则，而自由主义也正受左派和法西斯纳粹双方的威胁而奄奄一息。他们甚至不敢批评希特勒和日本军阀，继而我受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团之邀，协助他们提倡抗日，至莫斯科。大审、个人崇拜，都使我惊异。买东西常须摆长龙，物品的素质甚至不如上海，使我断言我们不能实行苏俄的共产主义，最使我反感的，是在红军博物馆看见外蒙已划入俄国版图。不过，我与当时莫斯科的中共的朋友相处甚好，而我对于中共代表团发表的《八一宣言》，更是百分之百的赞赏。

此时我已放弃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形成我自己的理论，此即新自由主义和文化史观。这在理论上见于《历史哲学概论》，在实际问题上，见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皆写于抗战初期。）

一九三六年，我离开莫斯科，到欧洲鼓吹华侨抗日运动，旋赴美国。当时美国报纸公开斥责德日，我也和一些美国朋友提倡抗日。这使我在当时很欣赏美国，我以美国可成为新自由主义之世界领导者。这希望在九年后美国主持雅尔塔密约后才告幻灭。

二、一闻卢沟桥之讯，我立即买舟归国（当时无空航）。到南

京后，我无实际参加抗战机会，继由南京到汉口办《时代日报》。后到重庆创办《祖国》与《民主政治》。

在此以前七八年间，我看的书，大都是外文书，看中文书机会很少。回国后，只有中国书可看，我也便有系统的读四部之书，我愈读愈发现中国文化之伟大，远超过我过去之所知。中国不如人者，只是科学，中国科学原先进于欧洲，且对其启发甚多，只是郑和航海以后，中国在嘉靖时开始闭关，加上八股之制，才使中国在思想上闭塞起来，而此时西方正在航海殖民运动中发展科学和资本主义，才使西洋经十七世纪科学革命而突飞猛进，中国停滞下来，西洋人后来居上，然而中国落后下来。于是我提出“复兴中国文化”的口号，只要我们能广求新知，循科学方法研究学问，我们一样能后来居上，而西化，俄化乃是自甘永落他人之后，而且中国与西方与俄国社会传统不同，环境和需要不同，二化决不能为救国之用，只有促使中国殖民化之可能。

继而日本投降之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我曾反对中苏条约之谈判，认为这有使中国亡于苏俄之危险，而朝野反以为是一种成功，以为能满足苏俄之欲望，可使在对中共作战之时，苏俄能保持中立态度。但不知斯大林能利用和挑拨国共战争。我想在我的新自由主义论中，在价值论上仍不脱乐利主义或功效主义，此适足以鼓励此种急功近利的思想，流弊甚大，必须修正。那就是必须以义为利，即以正义为价值之标准。

中苏条约以后，我以为只有国共和平合作才能使中国免于俄人宰制之祸。我发起和平运动，但首先受到国民党的禁止，因为他们自认半年之内即可将中共击败，结果不但是国民党的失败，亦是中國分裂之始，此时我便到了香港。

胜利以后，我重新看八年间我未看到的外国新书，以及有关史学理论的著作。到香港后看得更多。我又特别感到中国史学的

优越。例如，自孔子以至司马迁、班固，以因（承继）、革（改革）、损（废除）、益（增加），说制度与文化之进步，实比 Tohybee 所说“挑战、反应”更为周到。一国沉乱兴衰，即看一国能否在其社会的内外情势变动中固有文化不能应付之时，对其固有的文化进行适当的因革损益。

经过一九四五—五〇年间以上种种思考，我觉得我过去的文化史观缺点甚多。于是形成我的新历史哲学，我称之为“理论历史学”。这在理论上，大体有如《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第四版序言之所说（我研究历史之由来、经过与结果）。其与过去大不同者，首先，我由“人是创造文化的动物”出发，不用富兰克林“人为制造工具的动物”之说。其次，一个社会外部因素（自然与国际）与内部因素（技术、制度、学术）之变动及相互作用都引起社会的变动，而决定因革损益者，毕竟还是人与其学问。应用于中国历史，即《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应用于当时中国分裂之由来，则是《中国之悲剧》。在这小册子中，我说救国运动之失败，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知识不足，救国不得其道，首先是西化派之错误，后有俄化派之错误。应用于国际问题者，则有韩战发生后写的《俄帝必亡论》。

这时候，我还在香港，我的家人陆续集中香港后，我于一九五一年到了台湾。

三、到台湾的最初十年，我的写作主要是关于苏俄的。我写了《俄帝侵华史纲》、演讲“共产主义与虚无主义”，翻译苏联共产党二十次大会中赫鲁晓夫批斯的秘密演说。我应邀在军中、及各大大学演讲苏俄问题。一九五三年国民党政府宣布废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在联合国提出控苏案。在中美协防条约后，台湾有反对党运动，国民党政府不能容忍，两人入狱。我曾与成舍我先生发表声明抗议，继而写了《同舟共济》，希望本省人、外省人能够

团结共求复国。另一方面，匈牙利革命刺激了大陆知识分子，中共亦发动“反右运动”。继而有一九五八年之“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此时中共对于进攻台湾与苏俄发生歧见。苏俄欲以协助发展原子武器换取中国沿海控制权为中共所拒，中苏就开始公开论争了。这些问题我在许多短文及《同舟共济》中皆有评论。证明俄帝是危险之物！不可亲的。

四、此时美国对台湾除了协防条约之外，还有他的特别计划和布置，其最后目的是要台湾由中国分离，除了军事计划之传说外，在学界亦有活动，公开出面的是费正清在学院中奔走，游说对知识分子洗脑。又有一书店和杂志，是我开始即予赞助的，因我希望有一经常发表文章的地方。一九六一年末，此处有所谓“中西文化论战”，该书店再三邀我参加。我不知是他们要打倒我诱我入阵！然后围攻之计。我写了《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此文也未单单批评西化派；可是他们就动员四位大将对我不围攻。他们当时自认有无敌武器——逻辑实证论，不料全不中用。于是他们引诱我到台大演讲企图加上殴辱（他们受到听众的叱责不敢动手），继而在其杂志上借当年福建事变，戴我红帽子。我诉之于法。继而在一位老同学帮助之下，我办一份杂志，这便是在台湾出版三十年的《中华杂志》与《中华季刊》。

《中华杂志》之目的，是要根据学问和事实以及坚实的基础理论（方法论与价值判断论）研究国际情势，中国及世界之未来。为了端正这研究的根本，中华提出保持人格尊严、民族尊严、学问尊严和超越传统主义、西化主义、俄化主义而前进。超越者，就是要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西方历史与文化，以及俄国历史和马列主义有充分的知识，再以当世之新知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应有之因革损益，然后也自能抛弃西化、俄化之枷锁，走自己正当的道路。

五、在当前实际问题方面，在中国分裂以后的最初二十年间，我是赞同国民党的反共抗俄政策的。不过，我认为抗俄更为重要。原因是他要征服中国。而我所谓反共，非反对中共之党与个人，而是反对走俄国人的道路，行苏俄共产主义于中国，即反俄化。珍宝岛事件后，中共亦反对俄帝了，我即主张中国人应该统一起来共同抵御俄帝，免于核战之惨祸。而台湾也必须在思想上自立，力求中国文化之复兴，促进大陆之改革，而不可以美化为目的。

然而“文化大革命”仍在进行中，这使中国人统一抗俄不可能，我希望并主张和平统一。同时提出和平统一后新中国的图案。此略述于《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中，要点是：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走向民主政治、发展私人资本与国家资本，引进外国资本，加速工业化，并发展必要军备。对外必须力行和平政策，中国之武力除保卫固有领土外，决不对外侵略及干涉他国内政。中国亦决不与任何强国结盟，并愿以身作则，求世界之非核化。

六、天如人愿，经过一九七六年天安门示威，逮捕“四人帮”及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复出进行改革开放，是和平革命的成功，有助于中国日益走上正轨之道。

到了八十年代，我看到中国两岸在盘根错节之中，也各有重大成就，即大陆能发展尖端科学的原子弹和人造卫星，而台湾的经济发展成为四小龙之一，如两岸能够统一，即中国富强之基础。另一方面，苏俄的威胁虽未解除，但已不能构成致命的大患，而日本的军国主义虽在复活，目前也不足成为侵略的力量。但到了二十一世纪，国际情势如何变化尚不可知。因此，中国必在本世纪终结以前进行两岸谈判，研究和平统一，再建国家方案，永奠国家安全的基础。于是在一九八八年和一般大陆与台湾的朋友发起“中国统一联盟”，为和平统一之倡导。我以为和平统一的基础，

必须有一共同的宪法；和平统一必须由谈判，谈判的问题就已有的两部宪法进行检讨，再根据两个宪法实行的效果经验，以及新的事实和需要，然后合成一部新的宪法。关于国家重建之事，似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制度”最为重要。实际上，费边社会主义，尤其是其新文集以后，已无纯粹的社会主义。而凯恩斯以后，亦无纯粹的资本主义。于是有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混合经济与福利国家。我们可说，孙中山先生是最早提倡者，而甚至可说中国“古已有之”，如汉代之盐铁专卖，唐宋以来，陶磁及纺织是国营私营并进之类。

我于一九八八年访问大陆，意在与大陆朝野交换这些问题之意见，然后回台湾报告台湾朝野，以供参考。我受到大陆各界的欢迎，他们说对我的意见虽有不同意的，也愿加以研究。但在台湾，则受到意料不到的强烈敌视，直到回台以后，政府官员和台独人士还在立法院和社会上高嚷要对我“法办”，甚至还有自称西化派者之流要处我“唯一死刑”。但我知道，他们除了限制我两年之内不得出境以外，并无他“法”可“办”；而经过统联人士和香港公正言论对他们的恐怖的瓦釜雷鸣加以抨击之后，雷也息声了。

七、我研究台湾朝野之态度之原因，逐渐了解原动力并非出于中国人而出于外国人。不久，外国人公开警告台湾的“大陆热”必须降温，继而他们公然宣称要“拆散中国”，要联合一切国家反对儒学；而李洁明、司马辽太郎等也现身了。他们显然是要使台湾成为进攻大陆的基地。而最近菲律宾、越南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也是他们战略之一部分。而目前的挑衅则是一种试探。

八、这可见中国统一运动之难关，而且是与世界局势有关的。这需要所有中国人了解和注意，并且谨慎的应付。由于台湾太小，受制于外国人甚久甚深，尤其是许多知识分子甘心异化，使爱国之士成为少数派。因此，我们不得不寄厚望于大陆的朝野。

九、今天大陆当局是要力求安定，进行建设，在外交上对外国人及其猫脚爪极力隐忍自重，是正确的。但关于统一、建设之事，也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其一，台湾对统一的态度固受外人之挑拨，而他也常以大陆政治经济的缺点弱点为其辩护。大陆朝野是应有求其在我之处的。其二，我在大陆目睹现象中最令我难过的，是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对生态环境破坏之厉害。目前虽已注意于此，进行造林运动，但受了“生产力主义”之影响，似乎注意不足。生产力主义是十九世纪唯物主义的科学。二十世纪后期科学最大的成就是关于生命之秘密和环境之重要之发现。其三，六四事件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又一大挫折。事情发生固由于有外力作用其间，然外力能发生作用，则由于对马列厌倦因而对西化倾倒，这是思想问题。其四，“腐败”是今日大陆经济之癌。

多年来我极为高兴之事，是去年除夕，江泽民总书记为和平统一，对台湾提出八点声明。我以为其中最有意义的是第六点说：“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我相信以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号召统一，必定自己也决定以中华文化之优秀传统来改革自己。首先抛弃俄化论之残余，吸收世界上之新知，增益中国文化新的内容。这将增加自己之向心力，而使台湾若干自外生成者无所借口。其次，这也将能纠正大陆的若干西化派的偏向而加强大陆内部的团结。又其次，《左传》已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历代亡国，无不由于腐败，而这也必须保障人民监督的力量和言论自由，使贪污者无所逃遁。最后，中国古代虽无保护环境的学问，然必过勤俭生活，不可“暴殄天物”，“斧斤以时入山林”，不可“竭泽而渔”，都是环保思想。而中国文化主张人与天地万物之和谐，更是生态学之基本理论，而为中国文化之一大特色的。此所以我对江泽民先生提出的八点，特别是这一点而喜。

这是我在国家的忧患、危机与转机中的一些重要的思考。

李敏生先生将这本选集名为“中华心”，大概觉得我的这些拙文，皆是出自对中华民族的爱心、忧心、苦心及诚心而写的。这确是事实。我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感谢李先生给我这个机会使我对国事的一些诚恳意见，能就正于大陆同胞之前。而我写此长序，不觉词费者，也是想使读者更了解集中文章的用心及许多集中未尽之意。其次，我要感谢为此书作序的老友贾亦斌先生，为此集题字之钱伟长、季羨林二先生，以及为此集之出版尽力甚多的台湾淡江大学教授李寿林先生。

（一九九五年四月四日于台北新店中央新村之寓）

序

贾 亦 斌

胡秋原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教授和政论家，现任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他从十六岁开始发表文章，在长达七十年之久的笔耕生涯中，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文章和著作，内容涉及政治、哲学、历史和文化各个领域，著作等身，名扬海内外。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敏生同志，为了弘扬我国知识分子爱国优良传统和充实爱国主义教材，以及积极促进两岸文化交流，以求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经过数年辛勤劳动，从胡秋原先生浩瀚的文章著作中，精选三十多篇，四十多万字，汇编成册，题名为“中华心”，用以代表和反映作者七十年来对国家民族始终不渝的爱心，忧心、苦心和诚心。值此纪念我国抗日战争胜利和台湾光复五十周年，以及《马关条约》签订一百周年之际，该书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文化出版界的一个壮举，是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一件好事，值得庆贺！

书成之后，作者与编者均属序于予，予也不文，实不敢言序。但我作为秋原先生的老友，素以良师益友事之，敬其人而爱其文，并有感于敏生同志数年心血，和待人以诚，故不揣浅陋，就我所知，略抒所感！

我最钦佩的是秋原先生始终信守“人格、民族和学问三大尊严”，在他身上，不仅有博大精深的学问，而且继承和发扬了中国

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传统精神。相交多年，秋原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第一，他是一个真正爱国者；第二，他是台湾岛内首倡祖国统一的人；第三，他对中华民族文化有深邃的研究，而且提出深受国内外重视的“超越论”。

热爱自己的祖国，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任何形式的侵略，这是贯穿在其众多著作中的突出主题。秋原先生一介书生，对凡事关损害国家民族利益，他都不顾个人利害安危，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其爱国之切，忧国之深，谋国之忠，常有催人泪下难以自己者。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即主张抗日救国，一九二八年，当时他年仅十八岁，发表了处女作《日本侵略下之满蒙》，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九·一八”事变发生，他闻讯后愤然放弃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公费留学的机会，立即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他参与发起组织了“中国著作者抗日联合会”，起草了著名的《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一致抗日”。当时上海文化界名流几乎都在该宣言签了名。不久，上海被迫停战，他即参加“福建人民政府”任文化部长，继续反蒋抗日。失败后负笈英伦，在大英博物馆读书。1934年末，应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团之邀，在莫斯科担任《救国日报》，《全民月刊》的编辑，当时他与中共党员相处甚好，但在看到有的苏联地图竟将外蒙古划入其版图，甚为反感，因而离苏去美。秋原在美访问期间，得知“七七事变”发生，全面抗战开始，他为之激动万分，兴奋地宣布：“我等待的一天已经到了！”立即动身返国，投身抗战洪流，并赋诗明志：“敌强难免千回败，胜利当于最后求。”表达了对持久抗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回国后揭橥“巩固统一，抗战到底”，为团结抗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美英苏三国签订了《雅尔塔密约》，其中有关外蒙古和东北的条款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其后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又将这些条件强加给中国。秋原先生得知后，非常气愤，即上书国民党最高当局，痛切指陈其危害，力主“此约万不可定”。并以个人名义发表《参政员胡秋原对中苏谈判之声明》，呼吁民众共同反对。他还致信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指出美国不应为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并在面见赫尔利时，义正辞严驳斥其无理指责。使赫不得不承认他遇到了“罕见的勇者”。所有这些，使蒋介石极为震怒，下令撤除胡秋原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和《中央日报》副总主笔职务。胡先生为了爱国横遭无情打击，而愈挫愈奋，继续进行斗争。他真不愧是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秋原先生主张祖国统一，反对台湾独立，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一九八八年春，他在台湾积极宣传中国要统一，并在揭露和痛斥“台独”的卖国行径的基础上，发起组织“中国统一联盟”，并被推选为名誉主席。同年秋，他毅然冲破台湾当局长期以来阻挠两岸人士接触和讨论统一问题的禁令，前来大陆参观访问，成为台湾知名人士倡导两岸统一的第一人。在大陆访问期间，他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及各界人士、各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我也得有机会与老友朝夕相处，促膝谈心，获益良多。最使我感动的是我陪同胡先生访问北京大学，他向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当他谈到中国统一问题时说：“大陆在极短时间内，能制造原子弹、氢弹和使卫星上天，说明中国人能强；台湾经济建设，也为时不久即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说明中国人能富。如果我们中国能够统一，就很快可以富强起来！”话音一落，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也激动得热泪盈眶。此情此景，至今难忘。

秋原先生访问大陆，奔走统一，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掀起了一股“胡秋原旋风”。主张统一者莫不为之欢欣鼓舞，而“台独”分子却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甚至有人扬言要对他处以“死刑”，台湾国民党当局也声称要予以“法办”，但在国内外正义舆论压力下，最后“无法可办”，以开除党籍和“限制两年不得出境”了之。我在送别秋原先生后，无时不以他的健康和安全为念。正在此时，就收到他亲笔写的一张条幅，上有一首和我的七律诗。诗曰：

非有闲情事舞文，求真淑世是灵根。

不堪骨肉长冰炭，欲仗精诚挽陆沉。

故国归游逢旧雨，细谈治乱喜同心。

集思广益长安策，天下为公四海欣！

这首诗充分反映了秋原先生关怀祖国统一的迫切心情和坦荡无私的崇高精神境界。读后感佩无已。

还有一事使我难忘的，就是他在被限制两年不准离开台湾的期限刚满，竟又以老病之身第二次前来大陆访问。到京不久，就新、旧病并发，住进协和医院治疗。卧病期间他仍念念不忘统一工作，医护人员与亲友见此情况，无不为之感动。

秋原先生一生治学宗旨，在于“以求济乎祖国与苍生”，他着重深入研究中国文化，从而提出了“超越论”。他经常对我说：“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有独特价值，只是近数百年来科技一时落后而已。中国文化的精华是：仁义忠恕，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为公与和平精神。应以现代科学技术发扬之。既不能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奉行传统主义，更不能妄自菲薄，舍己从人，全盘西化。”他主张发扬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吸收各国优秀文化，超越传统和东西文化，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秋原先生的文化观是他对近代以来历次文化争论的总结，是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大

胆探索。我认为值得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最后，我愿以我与秋原先生惜别时的赠诗，作为本文的结尾和对《中华心——胡秋原政治·文艺·哲学文选》一书出版的祝贺。诗云：

中华杂志著宏文，最佩高明寻国根。
抗战笔锋常锐利，振兴壮志老深沉。
功名粪土书生气，海峡精禽赤子心。
喜看神州能“超越”，人民十亿更欢欣。